

《尺素频通》与晚清宁波商贸

龚纓晏¹

【摘要】台湾政治大学收藏的《尺素频通》，主要内容是清末泉州商人金叔在宁波经商期间所形成的商业信件。这些信件表明，宁波不仅是当时中国南北货的交易中心，而且还是国际贸易体系的组成部分。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将台湾割让给日本，也对宁波市场产生了重要影响。这些信件还表明，清末宁波市的商业竞争十分激烈，为了取得市场优势，生活在宁波的泉州商人还借助电报来传递商品信息。

【关键词】《尺素频通》 宁波 闽商 方豪

自唐朝开始直到民国时期，宁波城一直屹立于宁波港边。^①由于宁波港是位于中国海岸线中部的天然良港，因此，周边省份的众多商人纷纷来到宁波城进行贸易。福建因为与浙江相毗邻，所以，福建商人与宁波的关系尤为密切。《光绪鄞县志》这样写道：“鄞之商贾，聚于甬江，嘉道以来，云集辐凑。闽人最多，越人、吴人次之。”^②1759年，英国商人洪仁辉（James Flint）来到宁波时，与他进行贸易的三个商人“俱系福建人，在宁波开洋行生理”。^③根据清朝同治九年（1870年）所立的《重修福建老会馆碑》，宁波城里有三座福建会馆，分别是“八闽会馆”、“老会馆”和“大会馆”。^④可以说，福建人是推动宁波商贸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。那么，清代福建商人在宁波城里是如何生活、经商的呢？对此，很难找到详细的记载。所幸的是，一部题为《尺素频通》的手稿，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信息。

一、《尺素频通》及其作者

《尺素频通》是著名学者方豪于1958年或1959年“在台北某一旧书铺所购得”。方豪曾以这部抄本为主要依据，对清代福建商人的团体“郊”进行了研究，并且刊布了其中的部分信件。方豪介绍说，《尺素频通》原稿长22厘米，宽22.8厘米，“前封面一页与底封面二页均系后加，但与原封面题字，为一人笔迹。新加前后封面为洋纸。前封面与原封面左侧均题《尺素频通》四字，但前封面右侧题‘光绪二十年甲午元月仗轮局’十二字，而原封面右上角仅题‘乙未’二字。前封面正中不题字，原封面正中以隶书题‘宝口山樵’四字”，纸张上面则有“浅蓝色木板印成之格子。分上下两格，每面上下格各十五行”。^⑤方豪后来将这部珍贵的抄本捐赠给台湾政治大学，但很少有人知道其所在，更谈不上利用了。2011年，台湾学者邱澎生、刘序枫、林玉茹等人在台湾政治大学图书馆找到了这部《尺素频通》。2013年，台湾政治大学出版了林玉茹整理、点校的《尺素频通：晚清宁波与泉州、台湾之间的贸易文书》，同时附上了《尺素频通》原抄本的影印件。2014年，林玉茹还在大陆出版的论文集中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成果。^⑥

《尺素频通》主要是晚清泉州商人的通信抄稿。当时的泉州商人非常活跃，他们把从事与宁波的贸易称为“宁郊生理”或“做北生理”，把从事与台湾的贸易称为“做台生理”，他们的商业组织，则称为“郊”或“行郊”，^⑦“郊与明清中国盛行的会馆、公所及商帮不同，主要由操闽南语或类闽南语（潮汕语）的商人组成”。^⑧在泉州的商行还在其他城市设立代理行，“一般代理人往往收取百分之二的佣金，因此常被称为‘九八行’”，代理商与在泉州的本行之间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关系。如果代理商业绩突出，还会受到本行东家的嘉奖。为了扩大业务、提高收益，代理商除了为本行东家进行代理外，还为其他商行代理买卖。在宁波，也有一些来自泉州的代理商，“代理人必须帮东家代配船只运货到某地、收兑东家运来的货品，代处理各种帐款，协助讨债，并详尽地报告宁波市场的各项商品行情。甚至东家想要暂停做北生理或新增其他商品贸易时，代理商也仔细地剖析其利害得失，给予各种意见。”^⑨其中有一家名为“新竹记”的泉州商行，也向宁波派出了一位姓金的代理商，但此人名不详，我们姑且称其为

¹作者简介：龚纓晏，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。（宁波 315211）

项目基金：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“天一阁所藏文献分类整理与研究”（13&ZD089）成果。

“金叔”。

金叔在泉州有个名叫金竹如的表侄。1897 年左右,他说自己 23 岁,这样,他大概出生于 1874 年。从金竹如的信件中可以知道,他于 10 岁左右来到宁波,在金叔的代理商行里学做生意。金竹如的父亲喜食鸦片,他的姐姐已经出嫁,他的弟弟则游手好闲。这样,金竹如就成了全家的主要经济支柱。他本人曾从宁波回到泉州结婚,但婚姻生活并不美满。1895 年春,金叔因为母亲生病而从宁波返回泉州,并让金竹如负责代理行的生意。但金竹如显然没有把商行经营好,与伙计们的矛盾也很大,商行的声誉因此受到了损害。同年农历九月,金叔从泉州返回宁波,重整商行。其实,金竹如早有离开宁波的念头。他在给表弟金子僊(可能是金叔的儿子)的信中写道,自己“在宁将近十年”,由于“身体亏虚,半生多病”,所以“柔弱无断,延误十载光阴”。⁽¹⁰⁾金叔重回宁波后,金竹如决心离开宁波。1896 年春,金竹如辞去代理行的工作,返回福建,先后在厦门、泉州生活过,后来又上海谋生。1897 年,金竹如经泉州同乡介绍,来到日本人统治下的台湾淡水,做过代理商,还自行创业过,但经营状况并不理想,所以他自谦说“数载守羁,寸筹莫展”。⁽¹¹⁾

金竹如于 1896 年春离开金叔在宁波的代理行之前,特地誊录了金叔自 1894 年开始撰写的各种通信稿,“以作为未来独立经商时之参考”。1904—1905 年,在台湾淡水的金竹如“又再度誊写来淡水后及回溯一八九七年以前的家书和其他信稿”。⁽¹²⁾最后,金竹如将这些信件抄稿,以及委托他人代抄的《陶朱公理财要图》等资料合在一起,汇成一册,题为《尺素频通》。这样,《尺素频通》实际上分为两个部分。第一部分所抄录的,主要是金叔于 1894 年至 1896 年间在宁波的代理行所写的信件。第二部分所抄录的,主要是金竹如自己于 1897 年至 1905 年在台湾淡水期间形成的信件。所有这两部分信件,主要是通过轮船信局(简称“仗轮局”或“仗局”、“轮局”)而传递的。

《尺素频通》共收录了 74 件抄稿。林玉茹将这些抄稿分为七大类:商业信稿、贺年信稿、货函稿、商业讨债信稿、家书、一般信稿、杂抄(包括《陶朱公理财要图》、《十二悔偈》等)。其中商业信稿数量最多,共 23 封,主要是 1894 年至 1897 年间“金叔写给泉州新竹记、台南某行东、泉州陈某宗、鹿港船头行、泉州某仁兄、福州某仁兄等商业信件。其中,推测发给金叔的东家,即泉州新竹记的信稿居多,大概占一半以上。内容大多说明收发信、商业贸易营运状态以及大幅报导宁波市场的南北货行情。”⁽¹³⁾林玉茹还分析说:“在五十一件可以确定发生地的信稿中,高达三十九件、百分之七十七是由宁波出发,其他依序是上海五封、淡水四封、镇海二封以及厦门一封”,“收信地则在五十二封中,有三十六封是寄到泉州,占百分之六十九,其他依序是上海六封、台湾五封(其中鹿港二封)、厦门二封、宁波、镇海以及福州各一封。由此可见,这批信件主要是宁波与泉州通信的信稿”。⁽¹⁴⁾其实,镇海也是清代宁波府的属县。因此,林玉茹这样评价说:“《尺素频通》是目前唯一仅见,在一八九四——一九〇五年间以宁波为中心,为泉州、台湾各港担任代理商的闽南商人所抄写的通信信稿。”⁽¹⁵⁾

二、《尺素频通》所反映的晚清宁波商业状况

《尺素频通》为研究晚清宁波商业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原始资料。林玉茹主要从台湾历史的角度,对这批信件抄稿进行了深入的考察。如果从宁波历史的角度出发,则可以从这些原始资料中看到以下这些事实:

第一,宁波是南北货商品的交易中心。来自镇江、牛庄、青岛、胶州等北方地区的货物,主要有棉花、豆饼、生油、小麦、绿豆、乌枣、莲子、胡桃、人参等。来自浙江本地的,则有衢(巨)州的大米。来自台湾福建的,主要有糖、龙眼。而且,无论是糖还是龙眼,都分为许多种类。“以糖而言,至少可区分成青糖、白糖、水糖、白绵等类别。单以白糖而言,又可以从产地、颜色、商标、等级、大小以及新旧等面向,分成泉白、台白、鹿港总白、小台白、新城白、春庄高二档台白、鹿贡白、火车白顶尖、顶高白、拣吉、高二档小白、新小白;又有二档、三档等级之分,可以说琳琅满目,形色众多。”⁽¹⁶⁾这些来自中国各地的商品都汇聚到宁波,然后又被销往四面八方。

第二,宁波与台湾之间存在着直接的海上航线。关于晚清宁波与台湾的海上联系,学术界关注很少。金叔的信稿表明,来自台湾的帆船及轮船,经常运载砂糖到宁波来销售。他在光绪二十年(1894 年)年初报告说:“岁内台轮先后计运至小青万五千余

篓”，⁽¹⁷⁾“开正台府复到轮船一条，装到小青五千篓，新小白三百余篓，均未开盘”，⁽¹⁸⁾“鹿、笨船少到，沪船则以轮来”。⁽¹⁹⁾此处的“台府”是指台湾府，“鹿”指鹿港，“笨”指笨港，“沪”指沪尾（淡水）。可见台湾的主要港口与宁波都有直接的往来。鹿港的一家商行曾委托金叔在宁波购置货物，金叔说“宝舟到宁，敝无不一亟力代为办理”，⁽²⁰⁾结果这家商行一直拖欠货款，金叔为此不得不写信催讨。在《尺素频通》中，就保存着金叔向鹿港商行的两封讨债信。即使清政府因甲午战争失败而于1895年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之后，宁波与台湾之间依然保持着直接的联系。1897年，在上海工作的金竹如，因为“无利可求”，接受了一个泉州老乡的建议，决定前往台湾工作。他从上海乘坐“北京号”轮船到达宁波后，“探悉镇海有一商船装货直透淡水”，⁽²¹⁾因此决定“就镇海搭淡水船直透港”，⁽²²⁾以“省些转节途费”。⁽²³⁾由此可知，日本占领台湾后，从镇海到台湾是有直达商船的。

第三，宁波市场是国际贸易体系的组成部分。宁波是南北货物的交易中心，因此，市场行情深受中国其他地区的影响。金叔在报告宁波的早米价格时写道：“巨早糙因镇海、兰溪报涨，此地跟升2.9元。”⁽²⁴⁾他在为泉州的东家预测糖价时认为，“此去大局，全看海南北及三阳之到额，如谷、果、南糖本高源少，台、泉尊贵不足碍也”。⁽²⁵⁾此处的“海”应指海南岛，“三阳”则是指广东海阳、潮阳、揭阳。1897年，金叔报告说，宁波市场上砂糖销路疲软，后来有消息说，“洋商”在三阳、台南“扫采”砂糖，于是宁波“行情骤升”，“由冷转烈”。⁽²⁶⁾当然，对宁波市场影响最大的，则是上海。所以，金叔说，“宁市半亦跟申准绳”。⁽²⁷⁾更加重要的是，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后，宁波成为“五口通商”城市之一，被迫纳入到国际贸易体系之中，因而也就受到了国际市场的深刻影响。金叔曾报告说，由于“风传外夷、三阳一派，蔗丛丰茂”，⁽²⁸⁾结果导致宁波的糖价下跌。

金叔在同一份报告中写道：关于棉花，由于“初传印度边江失收，到夷来采。继闻东洋上海机局初成，急切待用”，所以宁波的棉花价格走高；与此相反，由于“旋闻厦门盛到洋米”，导致宁波米价“大跌”。⁽²⁹⁾在另一份市场报告中，金叔分析说：“香港报火车糖局抬价搜罗，青、赤两色被扫一空。虽吕宋青等续有运到，尚不敷本地车局一日之需，焉能分运内地”，⁽³⁰⁾因此，宁波的糖价将会上涨。所谓的“火车糖”，是指“由现代化糖厂所制成的糖”，⁽³¹⁾当时在香港生产火车糖的工厂有两个，一是太古车糖有限公司，另一家是中华火车糖局。金叔在分析棉花行情时则写道：“上海来书云，俄人欲与日本重开兵端，洋商停办。复到孟末花，积底充旺，大势看跌”，所以宁波的棉花价格也不会涨到哪里去的。此处所说的“孟末花”，即印度孟买所产的棉花。

当然，宁波的棉花价格，更多的是受到日本（东洋）的影响。如果日本大量收购，则宁波的棉花价格上涨。1895年，金叔曾报告说：“棉花被东洋扫采不休。踏车涨20.6元，各庄存积搜罗罄空。”⁽³²⁾第二年，他又报告说：“棉花被东洋采运不休，行情由20.2元，步涨21元。各庄存底被扫一空，现姚内虽续驳出，花身较次，价持挺不降。”⁽³³⁾报告中所说的“姚”，即宁波周边的余姚。相反，如果日本停止采购，棉花的价格就会下跌。金叔写道：“棉花，东洋扫采，升20.4元，现既停手，市旋转疲。”⁽³⁴⁾“东洋无销，上海跌价，此去必无人再驳，花势终当看软。”⁽³⁵⁾因此，晚清的宁波，实际上已经被纳入了国际贸易体系之中。

第四，在甬商人利用电报来传递市场信息。由于宁波的市场行情深受国内外其他城市的影响，因此，对于在宁波的商人来说，快速、准确地获得其他城市的市场信息，就成了商业经营的关键。而晚清，最快捷的通讯方式，就是电报。宁波是中国较早开通电话的城市。1882年，宁波城里就设立了电报局。⁽³⁶⁾《尺素频通》中，多次提到，生活在宁波的泉州代理商借助电报来传递市场信息。1894年，大量的砂糖从台湾运到宁波，而且“复传言尚有两轮装出，在即可到。至买者惊虚，莫敢再接。”于是，在宁波的代理商将此商情通过电报告知台湾，这样，台湾商船不再把糖运到宁波。此外，台湾的砂糖本来一路上扬，“上斗青高抬至4.56元。

后接宁电旋跌4.12元”。⁽³⁷⁾1895年，宁波“糖市疲败日久”，来自泉州的销路很差。在宁波的泉州商人将宁波的市场行情以电报的形式公布出来，结果商人们知道泉州的砂糖价格反而高于宁波，于是争相购买，市场行情因此“由疲转俏”。⁽³⁸⁾1896年底，在新糖刚刚上市之际，为了使泉州本地的商行能够了解宁波的行情，在宁波的泉州商人“爱集同人公奉电音”，要求泉州方面“切遏”糖价。⁽³⁹⁾当然，外地的市场行情通过电报传递到宁波之后，也会影响宁波的行情。1895年，金叔报告说，宁波的棉花价格本来呈下跌趋势，“贱卸无主”，但“昨突接申电云，洋人加价定额”，结果“昨今以来，一日三升，令人无从把握。”⁽⁴⁰⁾所以，金叔这样感叹说：“此刻中外一家，电音敏捷，寰宇之内，顷刻可达。铁路、轮船往来转瞬，起本苟非平贱，实难与并争道驰也。”⁽⁴¹⁾

第五，宁波的商业竞争十分激烈。晚清的宁波，商品辐辏，商人云集，商业竞争也十分激烈。这种竞争，有多种多样的表现方式，

例如不同产地同类商品之间的价格竞争。就砂糖而言,在《尺素频通》中经常可以看到,用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香港“火车糖”对闽台传统砂糖的冲击。金叔这样报告说:“十余年来,泉、台白糖,均患火车制压”。⁽⁴²⁾他还比较详细地分析说:“火车白近来仿照泉白颜色,成本较轻,加以运遍内地,可销单免捐,水客间有暗利,毋论远近,均趋此色,泉白销路顿减不少。”⁽⁴³⁾即使是同一产地的同一商品,也存在着激烈的价格竞争。1894年,金叔向泉州的东家报告说:台湾所产青糖在宁波本来就销路不畅,此时泉州峰尾的一条船运来“数百件”台湾笨港的青糖,并以很低的价格出售,致使青糖价格“骤跌太速,则轮船小青无敢问津矣”。⁽⁴⁴⁾

1895年,金叔报告说,正当龙眼在宁波几乎亏本销售时,又有“讨海船”(渔船)运到200多箱龙眼,而且“急欲售清”,⁽⁴⁵⁾致使龙眼价格进一步下滑。当然,最为激烈的,是宁波城里各类商人之间的竞争。这种竞争的主要表现,就是各个商行暗中杀价。在《尺素频通》中,就有“糖行暗卸”、⁽⁴⁶⁾“行存暗卸”之类的文字。⁽⁴⁷⁾特别是实力不强的小货行,往往闻风抛售,最终引发市场价格的剧烈波动。金叔就曾抱怨说:“糖行存货,先手脱卸,船头小货跟而求售,以故如风吹枯,一败涂地。”⁽⁴⁸⁾金叔还报告过由于各个商行争相杀价而导致的糖价混乱情况:“现下存底稍松,落去全看销纳阔窄,方有把握。惜人心不齐,动辄乱斩,全号之糖,行情一出,任扳不起。故有货同号异,行情高低,底差三、四者不等。时如长合顺仍2.65元,长合成、建兴、珍利2.23元,余皆2元以内至1.65元。”⁽⁴⁹⁾为了在商业竞争中占据优势,宁波的一些商人还结成同盟。1895年,金叔报告说,宁波“铺户四家合股”购入了市面上的龙眼,其他商家只得“争出问津。远近水客亦欲出采”。⁽⁵⁰⁾这四家铺户显然获得了充沛的利润。

第六,泉州商人与宁波商人联手进行商业竞争。在宁波的泉州商人,以共同的地域、语言、文化为纽带,组成了自己的团体“郊”。这些泉州商人无疑相互帮助、相互关照,但是,在商业利益面前,在宁波的泉州商人也会和宁波本地商人结盟。1895年,金叔报告说,为了垄断宁波的龙眼市场,使龙眼价格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,“予、大新、晋和三家合做,明约极多,售至四千箱为限,不能再售。”⁽⁵¹⁾此处的“予”即“余”,是金叔的自称。大新是宁波的一家糖行,经理叫陈秉厚,20世纪初资本为5千元。⁽⁵²⁾晋和也是宁波的一家糖行,应当位于江东,因为《申报》有过这样的报道:“上月二十二日,甬东司道头庆和号不戒于火,忽兆焚如。霎时烈焰飞扬,遂成不可收拾之势。当经各水龙驰至,汲水狂喷。”

越时始熄,然数椽巨屋已成瓦砾之场,幸四围俱系高垣,左右邻得免殃及。闻有晋和糖行司账伙某甲因惊成疾,竟致身亡,殊可悯也。”⁽⁵³⁾清末,宁波还有一家糖行,名叫“豫大”,经理是余绍庭,资本2.4万元。1896年,金叔比较详细地讲述了联合其他商行与豫大进行竞争的过程。当时,运载新产水糖的“诸船未到”,豫大商行计划将自己的存货低价售出,“意欲待诸船到日,藉作扳谈,贱煞采存”。金叔不无得意地写道:“敝揣其狡计,特邀大新落船看样开盘”,豫大商行“意动出留”,将“通郊计八百余桶”全部售给了金叔他们。金叔因此预测:“后船再到,看无跌面矣。”⁽⁵⁴⁾也就是说,等新产水糖运入宁波后,豫大已经不可能通过压低价格来进行竞争了。

第七,台湾割让对宁波市场产生了重要影响。1894年,甲午战争爆发。1895年4月,战败的清政府被迫签订《马关条约》,将台湾割让给日本。这一重大历史事件,对宁波市场有何影响呢?由于史料缺乏,尚无学者对此进行过讨论。而《尺素频通》则为我们保存了重要的原始资料。1895年5月底,日本侵略军在台湾强行登陆,台湾民众奋起抵抗。这样,在宁波,台湾所产青糖“两月未见船,栈货节次销出,积底渐薄”,价格上涨。

农历八月初,“台、鹿失守”的消息传到宁波,于是,“买客出采”、“趸户窥伺”,糖价坚挺。⁽⁵⁵⁾宁波的糖商甚至“共俾台湾失守,新糖绝粒,将来轧缺,不知涨至胡底”,结果“买客互相落手蓄存”,导致糖价“日升夜涨”。⁽⁵⁶⁾九月初三,金叔报告说:“旬日来,糖市甚见玲珑。先是报台南北开仗,人民逃散。旋又有禁装夷轮之信,买客闻无轮船赶装,年内无新青可到,互相落手蓄存。糖行积底销出将空,各欲谋扫客货”。⁽⁵⁷⁾十月二十四日,金叔甚至这样说:宁波糖市本来很差,白绵“粒无消出”,青糖“更少问津”,“幸台来信谓,日人横行,民心不安,各业生理不敢重新经营。东渡复回,年内按无新糖可到,人心稍壮,否则不知争卸胡底。”⁽⁵⁸⁾1896年农历一月,金叔在信中说:“月初以来,糖市特定,惟青糖虽未再加,市仍活泼。盖买者知全台不宁,人民迁游,蔗丛蹢躅,年内看无新青可到来。”⁽⁵⁹⁾由此可见,日本占据台湾之后,宁波市场立场作出了反应。从中也可看出,宁波与台湾之间的经贸关系是非常密切的。

三、余论

林玉茹介绍说,《尺素频通》其实“是抄稿,而非信件原件,抄写者不但未明白写出收发信人和日期,而且部分信中也隐去人名、商号名及货物名”,“加以其中又有帮他人代写的书信”,⁽⁶⁰⁾因此,这批信稿的原作者、收信者、抄写者、写作时间、写作地点、信件之间相互关系等,都很难确定。林玉茹不仅对抄稿上的文字进行了辨识,而且还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,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考证,并且基本上解决了这些问题。林玉茹还对大量的商业专门用语进行了解释,例如“七三银,即‘剑银’,又称剑钱,以银铸成,重九钱”,“随船,指船上所载之货物”,“大北,指福建、台湾往华北的贸易。小北往华中则为小北”,“通,售卖之意”,“成元,指涨跌近一元之谱”等等,⁽⁶¹⁾从而为其他研究者提供了便利。

不过,如果仔细阅读林玉茹整理的《尺素频通》,也可发现几处讹误,可谓百密一疏。例如书中说:“金竹如是泉州人,最迟于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六年之间,一直在宁波表叔的商行工作”。⁽⁶²⁾其实,这里的“一八九四年”,应为“一八八四年”年之误。金叔在 1895 年的一封信中写道:“巨糙 2.8 元,无现货,因久禁出口,行不多蓄。近求道宪,经蒙许允,昨禀批出,便可装船。”此处的“巨糙”,即指衢(简写作“巨”)州所产糙米。对于“道宪”,林玉茹注曰:“上海道宪,应是一八九五年任上海道台的黄祖络。”⁽⁶³⁾其实,此处的“道宪”应指在宁绍道台。金叔在另一封信中提到:“道宪以镇江等处米船少到,防不接,禁不准装运出口。”⁽⁶⁴⁾此处的“道宪”,也是指宁绍道台。考诸史籍,1895 年的宁绍道台是江苏仪征人吴引孙,⁽⁶⁵⁾也是晚清著名藏书家。他在扬州所建的测海楼,“是晚清东南地区颇负盛名的藏书楼,时人甚至将其与宁波范氏天一阁、虞山瞿氏铁琴铜剑楼、聊城杨氏海源阁并称‘四大家’”。⁽⁶⁶⁾

《尺素频通》真实而生动地表明,清朝晚期东亚海上贸易网络分布广泛,错综复杂,而要全面、深入地认识这一贸易网络,还需要结合其他区域的各类文献,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更加认真的研究。

注释:

1 龚缨晏、杨跃赞:《从千年府城到多核争辉——宁波城市发展轨迹》,《宁波大学学报(人文科学版)》2017 年第 4 期。

2 《光绪鄞县志》卷二,第 6 页,宁波天一阁博物馆藏。

3 故宫博物院:《史料旬刊》第 1 册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8 年版,第 195 页。

4 章国庆:《天一阁明州碑林集录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版,第 243 页。

5 方豪:《光绪甲午等年仗轮局信稿所见之台湾行郊》,《国立政治大学学报》1971 年第 24 期。

6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、韩国仁荷大学韩国学研究所:《海洋·港口城市·腹地:19 世纪以来的东亚交通与社会变迁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,第 50~68 页。

7 林玉茹:《商业网络与委托贸易制度的形成——十九世纪末鹿港泉郊商人与中国内地的帆船贸易》,《新史学》2007 年第 2 期。

8 林玉茹:《通讯与贸易——十九世纪末台湾和宁波郊商人的讯息传递》,《台大历史学报》2016 年第 58 期。

9(10)(11)(12)(13)(14)(15)(16)(17)(18)(19)(20)(21)(22)(23)(24)(25)(26)(27)(28)(29)(30)(31)(32)(33)(34)(35)(37)(38)(39)(40)(41)(42)(43)(44)(45)(46)(47)(48)(49)(50)(51)(54)(55)(56)(57)(58)(59)(60)(61)(62)(63)(64) 林玉茹:

《尺素频通:晚清宁波与泉州、台湾之间的贸易文书》,台湾政治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,第 17、269~270、197、11、13、8、26、22、36、44、51、161、171、173、249、66、45、143、157、131、77、147、37、102、128、122、132、36、88、132、82、132、153、127、45、112、101、132、131、76、96、96、122、137、60、75、69、121、4、34~77、11、138、154 页。

10 《民国鄞县通志·政教志》,辛编“交通”,第 11161~11162 页。

11 木村增太郎:《支那の砂糖贸易》,东京糖业研究会 1914 年版,第 301 页。

12 《甬江火警》,《申报》,1904 年 1 月 17 日,第 2 版。

13 清华大学图书馆等:《清代缙绅录集成》,大象出版社 2008 年版,第 57 册,第 327 页。

14 潘建国:《晚清扬州吴引孙测海楼及所藏通俗小说考》,《上海师范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》2003 年第 1 期。